



# 江淮群舒青铜器

安徽博物院 编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淮群舒青铜器 / 安徽博物院编著. —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98-4616-3

I. ①江… II. ①安…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安徽省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9910号

## 江淮群舒青铜器

JIANGHUAI QUNSHU QINGTONGQI

安徽博物院 编著

---

出 版 人	武忠平
选题策划	陈龙银 谢育智
责任编辑	欧阳卫东 黄 奇
版式设计	姜岱品
责任印制	徐海燕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 <a href="http://www.ahmscbs.com">http://www.ahmscbs.com</a> )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 编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604(省内) 0551-63533607(省外)
印 制	合肥锦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8-4616-3
定 价	1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孙卫东律师

# 江淮群舒青铜器

安徽博物院 编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江淮群舒青铜器》编委会

---

主 任：朱良剑

副 主 任：黄秀英 邓 峰 李治益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林	许建强	李丁生	吕昭文	张爱冰
张振华	陈曙光	何福安	杨璧玉	苏方军
范 文	金晓春	胡卫国	徐大珍	奚 明
唐根生	席为群	钱玉亮	程 红	储诚发

主 编：方 林

副 主 编：徐大珍

器物说明：程 露 王育茜 王 健 李 湘

摄 影：傅 渝

编 务：姜岱品

---

## 序 言

西周春秋时期，安徽江淮之间散落着舒、舒庸、舒鸠、舒龙、舒龚、舒鲍、舒廖等众多方国，据《左传》记载：群舒，偃姓，皋陶后裔。皋陶是继太皞、少皞之后的东夷首领，始居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其后裔偃姓部落中的一支舒人（居留地在今山东东阿一带）因反叛而屡遭周王室征伐，约在西周初年南迁至安徽江淮之间，陆续建立了诸多小方国，史称“群舒”，其地望在“淮水南，大江北，西至大别山，东至巢湖”的广大区域。春秋时期，因群舒地处南北地理要冲，被徐、吴、楚等大国先后争夺，终被楚所灭。群舒是江淮古方国中的荦荦大者，对江淮地区文明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关于群舒文化的历史学研究，主要有群舒同源与异源之说。1958年群舒故地舒城县凤凰嘴首次出土成组群舒青铜器，引起学界对群舒方国的关注和研究。以后陆续在庐江、肥西、寿县、六安、怀宁等地出土了大量群舒青铜器；长江沿岸的芜湖、铜陵、青阳等地也出土一批具有群舒风格的青铜器，推测为群舒族群南迁与文化传播的结果。

安徽江淮地区自古以来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江淮群舒青铜器既承袭中原文化风格，也有吴、越、楚文化的影响，而以群舒地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形成群舒青铜器独特的文化风格，代表性器物有牺首鼎、曲柄盃、折肩鬲等。

目前各地群舒青铜器收藏整体而言比较分散。安徽博物院藏群舒青铜器四十余件，占全省馆藏舒器之大宗。在研究方面，1964年已故安徽省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殷涤非先生发表《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成为群舒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肇始；他的《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从青铜器和铭文两方面论及舒国事；《铉鬲解》考察了凤凰嘴出土的附耳平盖鼎，认为其即为古史记载中的铉鬲。可以说，殷涤非先生首开群舒青铜器研究先河，为群舒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位已故安徽省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李国梁先生，系统总结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土的馆藏十组群舒青铜器，其《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成为群舒青铜器研究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论著。

近年来，随着国家社科项目《皖南商周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群舒文化比较研究》相继立项结题，学界对先秦时期安徽地域本土文化——群舒文化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院与省内其他藏有群舒青铜器的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合作，整理、出版了《江淮群舒青铜器》，其中部分资料为第一次公开发表。该图录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群舒文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图片资料与相关研究论文兼顾，资料性与学术性兼备是本图录的基本特点。它的出版仅仅是抛砖引玉，目的是为今后群舒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更全面的基础资料。

是为序。

朱良钢

2013年9月

## 凡 例

一、本书收录铜器的出土范围以安徽江淮地区为重点，共100件，分别出土于18个县（市），收录时间至2013年。

二、图版部分的编排，以出土地点、出土单元、收藏单位为组别，兼顾器物的年代，依次进行介绍。

三、器物命名以纹饰特征为主要依据，兼顾形制及铭文等特点。

四、每件器物依照图片、文字两部分进行介绍。器物图片包括器物主体、不同角度及局部图片等。

五、器物文字说明按器名、时代、尺寸、重量、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单位、器物形制及纹饰的简单描述逐项说明。

六、器物的长度以厘米为单位，重量以克为单位。

# 目次

序言			025 簋	春秋	46
凡例			026 曲柄盃	春秋	47
			027 缶形盃	春秋	48
概述		1	028 缶	春秋	49
001 兽面纹鼎	西周	12	029 曲柄盃	西周	50
002 凤纹鼎	西周	13	030 曲柄盃	春秋	51
003 兽面纹爵	西周	14	031 曲柄盃	西周	52
004 兽面纹爵	西周	15	032 觥	春秋	53
005 兽面纹尊	西周	16	033 夔龙纹钵	春秋	54
006 兽面纹鬲	西周	17	034 重环纹鼎	春秋	55
007 凤纹尊	西周	18	035 夔纹鼎	春秋	56
008 白鬲簋	西周	19	036 变形蝉纹鼎	春秋	57
009 环带纹鼎	西周	20	037 龙虎纹鼓座	春秋	58
010 直条纹鼎	西周	21	038 曲柄盃	春秋	59
011 牺首鼎	西周	22	039 牺首鼎	春秋	60
012 重环纹鼎	西周	24	040 匚形斗	春秋	62
013 重环纹鼎	西周	26	041 曲柄盃	西周	63
014 曲柄盃	西周	28	042 蝉纹鼎	春秋	64
015 鬲	西周	29	043 牺首鼎	春秋	65
016 牺首鼎	春秋	30	044 夔纹匚	春秋	66
017 夔纹鼎	春秋	32	045 缶	春秋	67
018 夔纹鼎	春秋	34	046 盥	春秋	68
019 缶	春秋	36	047 凤纹尊	西周	69
020 曲柄盃	春秋	37	048 曲柄盃	西周	70
021 牺首鼎	春秋	38	049 曲柄盃	春秋	71
022 夔龙纹鼎	春秋	40	050 盘	春秋	72
023 夔龙纹鼎	春秋	42	051 匚形斗	春秋	73
024 小口罐形鼎	春秋	44	052 蝉纹鼎	春秋	74



053 蝉纹鼎	春秋	76	081 鬲	西周	109
054 重环纹匜	西周	78	082 曲柄盃	西周	110
055 夔纹鼎	春秋	79	083 连体甗	春秋	111
056 簋	春秋	80	084 钺盃	春秋	112
057 牺首鼎	春秋	81	085 蝉纹鼎	春秋	113
058 缶	春秋	82	086 牺首鼎	春秋	114
059 缶	春秋	83	087 曲柄盃	春秋	116
060 小方盒	春秋	84	088 缶	春秋	117
061 簋	西周	85	089 夔龙纹匜	春秋	118
062 龙纹鼎	西周	86	090 夔龙纹鼎	西周	120
063 龙纹鼎	西周	88	091 兽耳尊	春秋	122
064 曲柄盃	西周	90	092 夔纹鼎	春秋	123
065 窃曲纹匜	西周	91	093 夔纹鼎	春秋	124
066 窃曲纹盘	西周	92	094 龙纹匜	西周	125
067 小方盒	西周	93	095 窃曲纹匜	西周	126
068 窃曲纹鼎	春秋	94	096 窃曲纹匜	西周	127
069 重环纹鼎	西周	95	097 窃曲纹鼎	春秋	128
070 乔夫人鼎	春秋	96	098 龙耳簋	春秋	129
071 夔龙纹鼎	春秋	98	099 窃曲纹鬲	春秋	130
072 龙钮盖盃	西周	100	100 窃曲纹鬲	春秋	131
073 窃曲纹鼎	春秋	101			
074 窃曲纹鼎	西周	102	论文		133
075 素面鼎	西周	103	参考文献		179
076 鸟钮壶形盃	西周	104	后记		184
077 窃曲纹甗	春秋	105			
078 窃曲纹鼎	春秋	106			
079 夔纹鼎	春秋	107			
080 弦纹鼎	春秋	108			



# 概述

方林

“群舒”一词出自先秦典籍。根据《世本·氏姓篇》及《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为偃姓，皋陶后裔。群舒包括《世本》记载的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和舒龚；《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之属宗和巢、舒、以及英和六。

群舒方国衰亡史实，《左传》有如下记载：僖公三年三月（公元前657年），“徐人取舒”；僖公十七年春（公元前643年），“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文公五年秋（公元前622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子燮灭蓼……”；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不克而还”；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鸠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请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二，吾又何求？若犹叛我，无辞有庸。乃还”；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冬，吴灭巢”；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

尽管史籍记载的群舒文献比较零散，但不难看到，当时的群舒诸方国分散羸弱，夹在吴、楚、蔡、徐各大国之间，四处危机，处境非常艰难。

根据文献资料，可大致梳理出以下偃姓小方国<sup>[1]</sup>：

舒庸，《左传·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囊师袭舒庸，灭之。”《读史方輿纪要》以为舒庸即清舒城县治，当今舒城县城内。

舒蓼，《世本·姓氏篇》：“楚东境小国也”，在今舒城东。《左传·宣公八年》：“楚为群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杜预注：舒、蓼，两国名。

舒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太平寰宇记》谓在舒城县城之内，与舒庸相近。

舒龙、舒鲍、舒龚，《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龙舒县，注引应劭曰“群舒之邑”，《太平寰宇记》以为在舒城西一百里，龙舒水西，略当今舒城西南之龙河口。舒鲍，《世本》以为“偃姓国也”，《太平寰宇记》云：“舒鲍城，在县西一百里龙舒水

[1] 陆勤毅，李修松：《安徽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

南，小于诸城。”舒龚，见于《路史·国名记》，其言兖州有龚丘与龚丘城。

舒，《左传·文公十二年》：“(楚)子孔执舒子平”，平为舒君之名。舒之地望，《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六言古舒国，汉置舒县，为庐江郡治。《史记·项羽本纪》之《正义》以为“今庐江之故舒城是也”。此舒的都邑当在今庐江西南至舒城一带。

宗，《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群舒叛楚，舒子平及宗子为楚所执。《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枞阳县，学者多考即战国鄂君启节铭文中之“松阳”。宗、松、枞古音相近，当为一名之异写，枞阳即松阳，也即古宗国。

巢，《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杜预注：“宗、巢二国，群舒之属”巢国地望，一说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一说在今六安市东北。

英，偃姓，皋陶之后。《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六安州志》称：州西有英氏城。英之地望当在今金寨县东南。

六，偃姓，皋陶之后，历夏商周三代约一千多年。杜预注：“六国，庐江六县。”《汉书·高帝纪》：“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颜师古注：“六者，县名，本古国，皋陶之后。”汉六县当今六安市东北。

蓼，《左传·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灭蓼。”蓼国旧城在霍邱西与河南固始县之间。

桐，《左传·定公二年》：“桐叛楚”。杜预注：“桐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当今桐城县北。

关于群舒文化的历史学研究，主要有群舒同源与异源之说。

顾颉刚先生《徐和淮夷的迁、留》<sup>[1]</sup>从古文字方面简要考证徐舒同源。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sup>[2]</sup>中认为：“‘徐’、‘舒’二字，古不仅同音，实即一字，群舒就是群徐。别部离开他们的宗邦，还戴着旧日的名字：住在蓼地的就叫做舒蓼，也就是徐蓼；住在庸地的就叫做舒庸，也就是徐庸。这一群带舒名的小部落，全都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离开宗邦的时候稍久，所用的字体也许小有不同，由于不同的字体记出，群徐就变成了群舒。”主张徐舒同源，群舒来源于古徐国。

郭沫若先生也主张徐舒同源。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sup>[3]</sup>中指出：“南国中徐楚为大邦，自殷亡以来，累世与周为敌，周人忌其名则称之为荆舒。《春秋》僖公三年言‘徐人取舒’，徐、舒为二者，乃徐人迭受周人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水以南，其残留于旧地臣服于周之部落，后乃沿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为二耳。旧称徐为盈姓，群舒为偃姓，盈、偃均嬴声之转也。”

徐中舒先生《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sup>[4]</sup>从古文字学方面考证“以文字言之，舒为徐之讹字”；从地理方面提出“徐与舒壤地相接，又同为从齐、鲁南迁之民族”。认为

[1] 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0年第11期。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

[4] 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群舒为徐之支子余胤之别封者”。

李修松先生在《徐夷迁徙考》<sup>[1]</sup>中提到“徐、舒之祖均为皋陶”，“徐夷和舒夷是同族……徐、舒不仅音同，而且本为一字。后来之所以区分徐、舒，只不过徐居淮北，舒居淮南，因方言不同而导致”。

顾孟武先生《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sup>[2]</sup>主张舒偃和徐嬴实一系而别支，群舒与徐与淮夷同属少昊集团。

何光岳先生《东夷源流史》<sup>[3]</sup>从群舒的来源、群舒的分布与衰亡和偃姓诸小国的分布讨论了偃姓和群舒方国的来源和迁徙，认为舒是徐的分支，东夷集团皋陶之后。他将群舒分为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以及宗、巢等八个小国，并分别分析其兴亡情况。

尹占群、赵明奇《淮夷文化初探》一文<sup>[4]</sup>认为，舒与淮夷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徐夷与舒夷之间则关系密切，并把徐归为舒夷。

胡赓《群舒史迹钩沉》<sup>[5]</sup>一文认为大约在西周初年，群舒人从大约今山东东阿县一带迁出，建立若干邦国，其散居与活动之地北抵淮河，南及长江，西限霍山山脉，东达巢湖西岸。

董楚平先生《吴越徐舒金文集释》<sup>[6]</sup>一书认为：“先秦文献，同音常可通假。余、舍古同鱼部，理可通假。但就浅陋所知，文献中尚未发现余、舍通假之例，可知余舍区别之严。”又提到“徐字诚然本作余……而舍字本不通余……舍舒上古音相同，舒国之舒可能本作舍”。

何琳仪先生《舒方新证》<sup>[7]</sup>从出土地下文献和地上文献相印证，主张徐舒不同源。刘信芳先生等人《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铸钟铭文初探》<sup>[8]</sup>，识别古钟离国铜器，并确证舒城九里墩鼓座铭文“童麓”为“钟离”。

根据以上研究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群舒为偃姓方国，皋陶之后。群舒方国活动的范围大致在江淮之间广大区域，即徐旭生先生所指出“淮水南，大江北，如今霍邱、寿县、六安、霍山、合肥、舒城、庐江、桐城、怀宁等县，西不过霍山山脉，东不过巢湖，这一带平坦的地带，除了六、蓼、钟离各国以外，全属群舒散居处的地域”<sup>[9]</sup>。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北至淮河，西至大别山，南至长江，东至苏皖边界的江淮广大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极具地方特色的周代遗存，主要集中于庐江、肥西、桐城、怀宁、六安等地，重要遗址有：肥东吴大墩遗址<sup>[10]</sup>，含山大城墩遗址<sup>[11]</sup>，霍邱扁担岗，绣鞋墩，六安

[1] 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 顾孟武：《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4] 尹占群、赵明奇：《淮夷文化初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0年第10期。

[5] 胡赓：《群舒史迹钩沉》，《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

[6]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7] 何琳仪：《舒方新证》，《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

[8] 刘信芳、阙绪杭、周群：《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铸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9]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 张敬国、贾庆元：《肥东县古城吴大墩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期，1985年。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2期。

众德寺，西古城，城东，寿县青莲寺，斗鸡台遗址<sup>[1]</sup>，六安堰墩遗址<sup>[2]</sup>，安庆张四墩遗址<sup>[3]</sup>，潜山薛家岗遗址<sup>[4]</sup>，枞阳汤家墩遗址<sup>[5]</sup>，庐江大神墩遗址<sup>[6]</sup>，霍邱堰台遗址<sup>[7]</sup>等。王迅先生的《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sup>[8]</sup>，以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在霍邱、六安、寿县地区的调查资料和肥东吴大墩遗址、含山大城墩遗址资料为基础，进行陶器和墓葬形制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并对周代淮夷各偃姓国文化的来源、发展和归宿进行了推断。王迅先生在该书中首次提出“淮式鬲”的概念：“有部分折肩、三足内聚，裆较高、足尖较细，具有地方特征，可称为‘淮式鬲’，是西周时期出现的淮夷典型陶器，前述铜折肩鬲（凤凰嘴铜鬲）即仿此造。”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周代遗存，以曲柄盃、折肩鬲、折腹簋、折肩盆等为考古学文化特征，有着显著的地方特色，与文献记载中群舒分布的地理范围相吻合，鉴于时代和地理位置的接近，学界认为这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应为群舒文化遗存。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若干重点遗址的发掘，江淮地区西周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年代框架已初步建立。以江淮分水岭为界，可大体把群舒故地分为北部淮河流域区、南部长江流域区和东部环巢湖区<sup>[9]</sup>。

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安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了对群舒分布的中心地区——舒城县杭埠河中游流域进行系统的区域考古学文化调查<sup>[10]</sup>。通过对采集的陶片标本结合周边地区的周代遗存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该地器型组合、文化特征均具有江淮地区特色，与文献记载中的群舒从地理位置和时间延续上也相吻合，初步断定该考古学文化遗存属于群舒遗存，其时间大致处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群舒故地陆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包括墓葬出土的铜器，保存情况较好的铜器窖藏和零星出土或收藏的重要铜器。这批明显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族群文化特征的典型青铜器，如牺首鼎、铉甗、汤鼎、曲柄盃等，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器物组合形式，目前学界已基本认定其与群舒族群有关联。

江淮地区出土群舒青铜器介绍如下：

1953年合肥市出土重环纹鼎<sup>[11]</sup>。

1959年舒城县龙舒人民公社凤凰嘴出土兽首鼎1、矩形钮盖鼎2、鬲3、甗形盃1、罐3、盘3、曲尺形器1、笔架状器1、扁平条状器1，共计16件铜器，同出有印文硬陶罐2。其

[1]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六安市堰墩西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2期。

[3] 北京大学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安庆市张四墩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期。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

[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庐江县文物管理所：《庐江大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2期。

[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8]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9] 张爱冰、张钟云：《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日第7版。

[10] 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11]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兽首鼎与盖形态独具特征，为首次发现<sup>[1]</sup>。

1964年舒城县河口乡杨家村许家山嘴春秋墓出土曲柄盃1、觥盃1、夔龙纹钵1<sup>[2]</sup>。

1970年合肥四里河出土乔夫人鼎1<sup>[3]</sup>。

1971年肥西县红卫公社小八里出土小方盒1、匜1、盘1、立耳盖鼎2、甗形盃1、簋1共计7件铜器，盘、匜内底有铭文，但锈蚀不清。同出玉器等。

1974年舒城县五里公社砖瓦厂出土兽首鼎1、平盖鼎2、甗形盃1、柱足鼎1共计5件铜器。

1975年寿县枸杞乡花门村肖严湖堤魏岗出土立耳盆形鼎1、小方盒1、簋1、兽形鼎1、匜1、罐2共计7件铜器<sup>[4]</sup>。

1976年六安县孙家岗思古潭义仓大队出土蟬纹鼎2、剑1<sup>[5]</sup>。

1976年宿松县隘口乡隘口村出土凤纹鼎1。

1977年肥西县王井公社磨墩子出土夔龙纹矩形钮盖鼎1<sup>[6]</sup>。

1978年庐江县泥河区盔头公社出土蟬纹鼎1、甗形盃1<sup>[7]</sup>。

1980年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和农器等170余件青铜器。其残存的鼎、薰、敦等部分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而其墓坑形制与埋葬方式有独特的地方特征，可能为群舒中的某一位君主，亦不能排除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可能。该墓出土一件戟上刻有“蔡□□之用戟”，同时出土一件青铜鼓座，所刻与舒鸠助吴诱楚事件有关，显示了春秋末期蔡与群舒的密切关系<sup>[8]</sup>。刘信芳先生等人释读鼓座铭文“童麓”为“钟离”<sup>[9]</sup>。

1981年肥西县金牛公社长庄出土立耳盆形鼎1、戈1、剑1共计3件铜器<sup>[10]</sup>。

1982年怀宁县金拱公社人形大队杨家牌出土立耳盆形鼎2、兽首鼎1、匜1、罐1、甗形盃1、共计6件铜器，同出削、绿松石、玛瑙块等<sup>[11]</sup>。

1984年舒城县砖瓦厂出土夔纹鼎1。

1987年望江县太慈乡竹山村出土矩形钮盖鼎2<sup>[12]</sup>。

1987年桐城市范岗出土夔龙纹鼎1。

1988年舒城县河口镇幸福村窑厂出土兽首鼎1、矩形钮盖鼎2、小口鼎1、簋1、罐1、带流罐1、甗形盃1、器盖1，共计9件铜器，同出印纹硬陶罐2、原始青瓷盂1、玉块26、漆盒2<sup>[13]</sup>。

[1]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期。

[2] 舒城县文化局：《舒城县文物志》1984年。

[3]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4] 寿县博物馆：《寿县肖严湖出土春秋青铜器》，《文物》1990年第11期。

[5] 邵建白：《安徽六安县发现两件春秋铜鼎》，《文物》1990年第11期。

[6]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7]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8] 陈秉新：《舒城鼓座铭文初探》，《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9] 刘信芳、阚绪杭、周群：《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铸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10]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肥西县金牛春秋墓》，《考古》1984年第9期。

[11] 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县出土春秋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12] 宋康年：《安徽望江出土春秋时代铜鼎》，《考古》1989年第10期。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舒城县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6期。



1988年庐江县岳庙乡十八桥村莫庄出土兽首鼎1, 甗形盃1, 匚形勺1共计3件铜器<sup>[1]</sup>。

1989年六安县毛坦厂镇燕山村走马岗出土尊1, 甗形盃1, 弇口鬲形盃1、盘1、器盖1, 匚形勺1、削柄1共计7件铜器, 同出青瓷碗1、印纹硬陶罐2<sup>[2]</sup>。

1989年舒城县南岗镇郭店村出土变形蝉纹鼎1。

1991年1月舒城县干汊河镇瑜城村出土重环纹鼎1。

1993年潜山县梅城镇七里村黄岭出土连体甗1, 鬲4, 甗形盃1, 镬盃1, 共计7件铜器, 同出陶罐4<sup>[3]</sup>。

1994年, 桐城市高桥镇长岗出土兽耳尊1、立耳盆形鼎1、同出铜矛7、铜镬5<sup>[4]</sup>。

1994年, 宿松县程岭乡乔木村出土兽面纹鼎1。

2005年无为县开城镇大童村出土窃曲纹鼎1, 素面鼎1, 窃曲纹甗1, 鸟钮壶形盃1。

2006年无为县襄安镇文思村出土夔纹鼎1, 窃曲纹鼎1。

皖南地区:

1983年铜陵市金口岭出土甗形盃1。

1971年铜陵市火车站基建工地出土鸟盖兽耳盃<sup>[5]</sup>。

1983年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乡出土窃曲纹鼎2<sup>[6]</sup>。

1985年南陵县家发乡长山出土甗形盃1<sup>[7]</sup>。

1985年郎溪县出土立耳鼎1、矩形钮盖鼎1<sup>[8]</sup>。

1987年芜湖市柳春园人大工地出土兽首鼎1<sup>[9]</sup>、甗形盃1。

1989年7月, 铜陵市北郊谢垅变电所基建工地出土立耳盆形鼎1、矩形钮盖鼎1、分体甗1、甗形盃1、匚1共计5件铜器<sup>[10]</sup>。

1990年铜陵县钟鸣镇出土甗形盃1<sup>[11]</sup>。

1993年铜陵市狮子山出土鼎1<sup>[12]</sup>。

1997年繁昌县赤沙乡新塘出土甗形盃1、镬盃1<sup>[13]</sup>。

1998年铜陵县西湖轮窑厂出土甗形盃1、甗1、夔纹鼎1、柱足鼎1, 共计4件铜器<sup>[14]</sup>。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群舒青铜器的研究进入发展阶段。1964年殷涤非《安徽舒城出

[1] 马道阔:《安徽省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合刊。

[2] 安徽省博物馆,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墓葬》,《考古》1993年第7期。

[3] 潜山县文物局:《潜山黄岭春秋墓》,《文物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01年。

[4] 江小角:《桐城出土春秋时期青铜器》,《文物》1999年第4期。

[5]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6]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7]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8]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9]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 张国茂:《安徽铜陵谢垅春秋铜器窖藏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11]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2]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3]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土的铜器》<sup>[1]</sup>是群舒文化研究的第一篇考古发掘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舒城凤凰嘴出土的一组牺首鼎、曲柄盃、折肩鬲等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器，并论证为舒器。他的《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sup>[2]</sup>从青铜器和铭文论及舒国事，在《铉鬲解》<sup>[3]</sup>中考察了凤凰嘴出土的附耳平盖鼎，认为此鼎即为古史记载中的铉鬲。

李学勤先生《新出青铜器研究》<sup>[4]</sup>多篇考订汉淮、徐淮新出铜器；著作《东周和秦代文明》<sup>[5]</sup>一书推定舒城凤凰嘴为群舒之遗存，其年代在春秋中期。李国梁先生《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sup>[6]</sup>系统总结了90年代以前出土的十组共73件成组群舒青铜器，分别是舒城凤凰嘴、肥西小八里、舒城五里、六安思古潭、寿县魏岗、肥西金牛、怀宁金拱、舒城河口、庐江岳庙和六安燕山村，以及桐城县桃源乡重环纹鼎等单个器物。对各组器物的组合、形制、纹饰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期，并讨论了群舒与徐国等方国的关系、群舒的衰亡过程。《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5前言《吴越徐青铜器概述》<sup>[7]</sup>著录了群舒青铜器，从出土地点、数量、形制、纹饰对舒器进行了介绍。杜迺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sup>[8]</sup>对牺首鼎、双龙耳尊和异形盃进行了介绍和考察，认为此类风格独特的青铜器应为舒器，并在《古代青铜器》<sup>[9]</sup>中对上述铜器进行了考订。

1990年马道阔先生对庐江县岳庙乡十八桥村莫庄出土的兽首鼎、甗形盃和匚形勺结合文献推测该组器物为宗国器，又联系舒城、肥西等地风格相同的铜器推测它们属南淮夷诸邦国<sup>[10]</sup>。

1996年马今洪先生《流甗的研究》<sup>[11]</sup>对甗形盃的多种类型以及起源、功用、定名、族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000年张钟云先生《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sup>[12]</sup>对所选青铜器材料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和分期，明确其文化因素和国属，对徐舒关系进行了探讨。

2003年郑小炉先生《试论青铜甗(鬲)形盃》<sup>[13]</sup>收集了群舒、黄国的陶质、铜质甗形盃，对甗形盃的起源、功能、发展演变趋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甗形盃的国属，论证了群舒范围可能已经越过长江的观点。另文《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sup>[14]</sup>以群舒甗形盃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对群舒青铜器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对青铜兽首鼎的来源及流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期。

[2] 殷涤非：《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江淮论坛》1983年第1期。

[3] 殷涤非：《铉鬲解》，《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4]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5] 李学勤：《东周和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 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0年。

[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1—东周5》，文物出版社，1997年。

[8] 杜迺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9] 杜迺松：《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 马道阔：《安徽省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合刊。

[11] 马今洪：《流甗的研究》，《文博》1996年第5期。

[12] 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 郑小炉：《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

[14] 郑小炉：《试论青铜甗(鬲)形盃》，《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2004年毛颖先生等《南方青铜盃研究》<sup>[1]</sup>系统研究了两周时期江淮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各类青铜盃，文中对群舒式青铜甗形盃的分布区域、文化特征和形成进行了探讨。

2009年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sup>[2]</sup>对肥西县柿树岗小八里、肥西县金牛公社长庄、六安县毛坦厂燕山村等部分典型群舒青铜器及舒城九里墩墓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特征、文化因素、年代、国属等进行了探讨。

2009年张爱冰先生在《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sup>[3]</sup>一文中，通过对安徽铜陵市郊谢垅窖藏所出器物的组合、形制和纹饰的分析研究，将其年代拟定为不晚于春秋早期，提出该组器物可能反映了江淮群舒族群的向南迁播。

2010年杜迺松先生《徐国与群舒青铜器》<sup>[4]</sup>一文肯定了牺首鼎为群舒特有之物，并根据牺首鼎的特点风格提出其年代以定在春秋前期为宜。

2011年张爱冰、张钟云先生《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sup>[5]</sup>对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释，论证了群舒青铜文化研究的迫切性，并提出了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展望。

2011年，王峰博士论文《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sup>[6]</sup>对包括群舒青铜器、钟离国青铜器、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等在内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器进行了型式划分、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并论证了其族属。

关于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典型资料，一是墓葬出土的铜器，这些墓葬不仅随葬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而且常有呈一定组合的陶器伴出，相对年代和共存关系明确可信；二是保存情况较好的铜器窖藏；三是零星出土或收藏的重要铜器。

江淮群舒青铜器的常见器类，主要有牺首鼎、曲柄盃、龙螭匜等。

鼎根据器形不同，主要分为：牺首鼎，见于舒城凤凰嘴、舒城河口窑厂、舒城五里砖瓦厂、怀宁金拱杨家牌、庐江岳庙莫庄、庐江三塘、寿县肖严湖魏岗；矩形纽盖鼎，见于舒城凤凰嘴、舒城瑜城村、河口窑厂鼎；盆形鼎，见于肥西小八里、舒城五里、六安思古潭、寿县魏岗、庐江泥河盩头、怀宁金拱杨家牌等；鬲形鼎，见于合肥四里河乔夫人鼎；小口鼎，见于舒城河口小口罐形鼎。

牺首鼎是群舒青铜器特有的器型，最具群舒文化特征和代表性。其基本形态是圆腹鼎体的一侧作兽首状，兽首一般有犄角和凸起的双目，另一侧有扉棱作兽尾。附耳直折向上，有密合盖，盖上置环钮。三蹄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牺首鼎的独特之处在于兽首和容器的连铸，密合盖置于兽首后项，无流口。根据出土资料，葬有牺首鼎的墓，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较高。牺首鼎独特的设计构思、华丽的审美意趣，应该是祭祀的青铜礼器。目前，除群舒故地和皖南地区出土造型独特的牺兽鼎之外，可见资料还有邳州九女墩三号墩

[1] 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 张爱冰：《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4] 杜迺松：《徐国与群舒青铜器》，《团结报》2010年12月30日第8版。

[5] 张爱冰、张钟云：《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日第7版。

[6] 王峰：《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牺首鼎<sup>[1]</sup>与绍兴306号墓<sup>[2]</sup>出土牺首鼎残片。

铉鼎也是群舒青铜器重要器物，其附耳、平盖、中央环钮及盖周三矩钮等形式对春秋中晚期以后的鼎形器影响深远。其基本形态是，长方形附耳，子母口，平盖有直裙，深腹微垂，三蹄足。一般盖中置环钮，盖周置三个矩形捉手。殷涤非以凤凰嘴所出考证铉鼎之制，鼎盖上可以抽插、横穿盖钮以贯鼎耳的铜棍为铉，覆于鼎盖上的疏布巾为鼎，故名<sup>[3]</sup>。鉴于铉鼎之谓学界尚存有不同看法，本图录根据器物纹饰特点命名为夔龙纹鼎。这种矩形钮盖鼎来源可以在霍邱堰台西周遗址<sup>[4]</sup>陶质鼎盖中找到踪迹，但其主体器型应当为受到中原鼎的影响而加入本地因素改造的产物。

小口罐形鼎春秋中期后在绍兴M306、浙川下寺<sup>[5]</sup>、寿县蔡侯墓<sup>[6]</sup>均有出土。小口罐形鼎在楚国青铜器中所占的比重尤甚，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流行时间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晚期。目前江淮地区群舒重要活动区域舒城县河口窑厂出土的小口罐形鼎年代最早，其与楚國小口鼎的渊源关系有待进一步讨论。

曲柄盃也是群舒故地出土较多且极具群舒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江淮地区主要出土于六安、肥西、舒城、庐江、怀宁这一狭小区域。其基本形态是，上部为盆或钵，下部为三袋足鬲形器。腹设一流一鋬，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鋬为卷曲形，由两截组成，上半截作卷曲角状，或顶端作兽首，下半截为圆筒状，两截连接处的鋬口各有一对穿孔，以与它物连成整体。其名称也有甗形盃、鬲形盃和流甗的不同。本图录根据器物特点，统称为曲柄盃。曲柄盃的形制来源于西周至春秋早期江淮地区薛家岗、枞阳汤家墩、六安堰墩、霍邱堰墩、庐江大神墩等遗址陶质曲柄盃，如潜山薛家岗H38，庐江大神墩T323③：1等，可见群舒青铜器典型器物曲柄盃源于本地西周时期陶质曲柄盃。

折肩鬲在1959年舒城凤凰嘴春秋墓<sup>[7]</sup>出土3件、1993年潜山黄岭春秋墓<sup>[8]</sup>出土4件。其基本特征是，侈口，束颈，折肩，高弧裆，尖锥状足。三尖锥状足的陶折肩鬲最早见于江淮地区<sup>[9]</sup>，而青铜折肩鬲形制等同于六安、霍邱等群舒之地活动区域周代遗址出土的陶质折肩鬲，因此，其渊源应来自于本地地区的折肩陶鬲。

匜，江淮地区多见龙形鋬三足或四足匜，如寿县肖严湖魏岗三足龙形鋬匜、怀宁金拱杨家牌匜；肥西小八里四足龙形鋬匜。此外，江淮地区也出土有燕尾鋬匜，如天长谭井村、凤阳李二庄、宿县平山村匜。

群舒青铜器上常见的几种变化较多的主体纹饰或装饰，主要有夔龙纹、窃曲纹、几何

[1] 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2] 牟永抗：《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3] 殷涤非：《铉鼎解》，《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6]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五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

[7]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期。

[8] 潜山县文物局：《潜山黄岭春秋墓》，《文物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01年。

[9] 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